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 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第十位缪斯

法国文学研究中的自觉

郭宏安◎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第十位缪斯

法国文学研究中的自觉

郭宏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位缪斯：法国文学研究中的自觉 / 郭宏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2611 - 0

I. ①第… II. ①郭… III. ①文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①I565. 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20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2

字 数 481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实践研究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 | |
|-------------------------|-------|
| 自序 批评:形成条例的印象 | (1) |
| 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 | (1) |
| 圣伯夫:在现代性的门槛上 | (19) |
| 波德莱尔:连接新旧传统的桥梁 | (46) |
| 钱锺书与白瑞蒙 | (73) |
| 加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 (94) |
| 加缪与小说艺术 | (122) |
| 让·斯塔罗宾斯基与居斯塔夫·朗松 | (140) |
| 脆弱的平衡 | |
| ——读茨维坦·托多罗夫的《文学在危难中》 | (150) |
| 已读与未读之间 | |
| ——谈彼埃尔·贝亚尔的《怎样谈论没有读过的书》 | (164) |
| “池塘生春草”:康复者眼中的世界 | |
|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后随想二 | (183) |
| 巴尔扎克:观察者? 洞观者? | |
|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后随想六 | (189) |
| 卢梭:三百岁的孤独漫步者 | (197) |
| 《沉默的人们》与现实主义问题 | (206) |
| 从《墙》看存在主义与小说 | (215) |
| 《小王子》:风雨兼程七十年 | (220) |
| 《沙漠》:悲剧·诗·寓言 | (231) |
| 火星人? 现代人? | |
| ——《一对年轻夫妇》译本序 | (244) |

| | |
|--------------------------------|-------|
|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译本序 | (250) |
| 谁是少数幸福的人 | |
| ——《红与黑》代译序 | (267) |
| 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 | |
| ——谈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 (282) |
| 《恶之花》译跋 | (292) |
| 《巴黎的忧郁》译者序 | (297) |
| 酒、印度大麻与鸦片 | |
| ——《人造天堂》译者前言 | (309) |
| 《现代生活的画家》译序 | (324) |
| 《小王子》译序一 | (333) |
| 圣 - 埃克絮佩里、小王子和《小王子》(译序二) | (340) |
| 《大西岛》译序一 | (356) |
| 《大西岛》译序二 | (359) |
| 《大西岛》的魅力 | (362) |
| 评乔治 · 布莱的《批评意识》 | (366) |
| 《镜中的忧郁》译后记 | (379) |
| 《反现代派》译后记 | (404) |
| 文学批评断想 | (425) |
| 加缪:美与历史的博弈 | (444) |
| 蒙田的《随笔集》和现代随笔 | (453) |
| 随笔与随笔习气 | (479) |
| “随笔”初探 | (481) |
| 后记 | (484) |

拉辛与法国当代文学批评

在法国的文坛上，20世纪是名符其实的批评的世纪。声名赫赫的圣伯夫是在1900年借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之力才登上批评之王的宝座的。嗣后，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彼此交锋，蔚为壮观。文学批评仿佛一下子挺起了胸，尽扫往日那种内心里羡慕创作的自卑心理，流派蜂起，名家辈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场面。一向颇受冷落的批评界头顶上仿佛罩了一重光环，居然想兼容人文科学各学科的新成果，成为文学王国中最崇高的领地，而几乎所有新进的批评家都自认“能够而且应该比作家知道得多”^①。如果说19世纪还有作家对批评表示蔑视，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但在20世纪却很少有人敢对批评表示不敬了。据统计，仅1956—1966年这十年间，用法文出版的批评著作就达七千种之多，相当于小说的一半，超过了诗歌的总和^②。批评界的香火可谓盛矣。然而，流派虽多，大都是方生方死，转眼即成明日黄花；名家虽众，常常是争论不休，外战方停内战又起；著述虽丰，不少是故弄玄虚，寻常读者无由问津。那么，法国究竟有多少种批评理论？有多少种批评方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有不少批评家喜欢串门搬家，实难说清他们的籍贯和住址。1963年，最喜流动的罗兰·巴特说，在法国同时存在着两种批评，一种是“大学的批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批评”^③。他把法国众多的批评流派分为两大家，可谓快刀斩乱麻。这两种批评是共处的，但它们的共处却不是和平的。果然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一场批评界的“欧纳尼之战”。对垒的双方，一方被称作传统批评，一方被称作新批评。

① 见乔治·布莱主编《目前批评的道路》，巴黎，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③ 见罗兰·巴特《批评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4年版，第246页。

新旧两军交战，选的是一个古战场，即三百年前的拉辛悲剧。《论拉辛》（1963年）的作者罗兰·巴特写道：“十几年来，在法国进行的多少有些重要性的批评都与拉辛有关，例如：吕西安·戈德曼的社会学批评，夏尔·莫隆的精神批评，让·包米埃和莱蒙·毕加尔的生平批评，乔治·布莱和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深度心理批评……”^① 巴尔特本人进行的则是结构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所谓批评界“欧纳尼之战”，正是恪守传统批评的巴黎大学教授莱蒙·毕加尔对新批评的首领罗兰·巴特发起的反击。双方打出来的牌都是拉辛：莱蒙·毕加尔写有《拉辛的事业》（1961年），罗兰·巴特写有《论拉辛》（1963年），吕西安·戈德曼写有《隐蔽的上帝》（1955年）和《剧作家拉辛》（1956年），夏尔·莫隆写有《拉辛作品和生平中的无意识》（1957年）。批评的“欧纳尼之战”与文学的“欧纳尼之战”不同，并没有分出胜负，只是留下了几部著作，作为这次论战的见证：莱蒙·毕加尔的《新批评还是新骗术》（1965年），罗兰·巴特的《批评与真理》（1966年），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的《为什么要有新批评》（1966年）以及让·保尔·韦伯的《新批评和旧批评》（1966年）。

资料的缺乏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很难十分清楚地看见那个古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些人，如新批评的两员主将，乔治·布莱和让·斯塔罗宾斯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但是，我们总可以就目力所及，对双方的情况进行一般的描述。为此，有必要先把这个古战场清理一番，为拉辛及其悲剧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再来看对垒双方的阵容和战法。

一 拉辛的生平和作品

让·拉辛于1639年生于外省的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一岁丧母，三岁丧父，遂由姑母和祖母抚养。他先被送进姑母隐居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六年后，他的祖母也隐居此地。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是让森教派的大本营之一。让森教派是天主教内部的反对派，也是专制王权迫害的对象。

^① 罗兰·巴特：《批评文集》，第246页。

象。这一派的教义认为世界已经坏到极点，根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过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因此，它的信徒们都主动地放弃社会中的进取，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世人称他们为“孤独者”。让森派的教义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某些阶层有着相当大的精神上的影响。拉辛自幼在让森派的学校中读书，他的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者，但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受到的却是森严的让森派教义的熏陶。在知识上，他受到的是当时欧洲最好的人文主义教育，而在精神上，他受到的却是最严密的禁锢。拉辛终于未能如师长所愿，在修道院过孤独的隐修生活，而是在十九岁那年到巴黎去学习，追求功名。对于一个贫穷但是有才能的青年来说，唯一有希望成功的道路是写作。最初，他写了几首称颂国王的诗，得到国王的赏赐。随后，他写了两部悲剧：《忒巴依德，或兄弟阋墙》和《亚历山大大帝》。正当他准备写作《安德洛玛刻》的时候，让森派的尼古拉，拉辛先前的一位老师，与让森派的敌人发生论战，在文章中写道：“小说家和戏剧诗人是公开的投毒者，不是毒害信徒的肉体，而是毒害他们的心灵……”让森派反对一切世俗的活动，对文学创作更是视若寇仇。1667年，拉辛自认受到攻击，于是加入论战，宣布与让森派决裂。1667年，拉辛写出《安德洛玛刻》，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以后，他陆续写出《布里塔尼斯》、《贝雷尼斯》、《巴雅泽》、《米特里达特》、《伊菲吉妮》，直到1677年，写出他最重要的悲剧《费德尔》。《费德尔》演出的成功引起了敌对集团更猛烈的攻击。同年，路易十四要求他停止一切戏剧活动，与布瓦洛一起做他的史官。拉辛在《费德尔》的序言中表示了与让森派和解的愿望。拉辛停笔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三次随从路易十四亲征。1690年，他被封为国王侍臣，1694年，他担任国王的私人秘书。拉辛晚年写过两出悲剧《爱丝苔尔》和《阿塔莉》，并可能于1693年着手编写颂扬让森派的《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简史》。他被指责信奉让森派教义，与路易十四关系日渐疏远。1699年，拉辛逝世。

拉辛一向被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典范。他是剖析女性心理的圣手，描绘人类热情的巨匠。他的剧作情节单纯，冲突激烈，人物不多，语言清晰。因此，各种流派的批评都想在他身上试试功效如何。

战场清理即毕，我们可以检阅交战双方的阵容和战法了。但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几部著作大都洋洋数十万言，我们只能摘取其一、二小例，略加申说，以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之效。

二 传统批评

传统批评指的是由圣伯夫开创，中经泰纳改造，由朗松集其大成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虽不免有许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始终是一种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通过作品以外的因素来考察作品的批评方法。这些因素，可能是作者的生活、气质、爱好，也可能是作家所处的“种族、环境、时代”。这种批评方法到了朗松的手里，经过一番修补改造，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的方法。朗松曾经指责圣伯夫“把生平研究几乎当成了批评的全部”，“不是用生平解释作品，而是用作品代替生平”^①，他也不满泰纳的所谓“科学的批评”。1963年，罗兰·巴特指出：“五十多年以来，朗松的著作、方法和思想通过其无数的追随者支配着大学的批评。”^② 可见其影响之深且广。

朗松的批评方法，是从“真实”出发，将对作品的评价置于客观的事实之上，在下结论之前，要尽量收集全面的、不容置疑的材料及前人研究的成果。他在给学生制订的工作计划中说：“建立作家的年谱，确定日期，对照版本，利用杰作，找出成因，弄清事件的原委，从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③ 他特别强调制订一份详尽的参考书目，确定作品产生的原因，考证不同的版本。他说：“我们的主要工作在于认识文学作品，加以对比，从共性中区分出个性，从传统中区分出独创，依照体裁、流派、运动把作品加以分类，最后确定它与我国的文化、道德、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欧洲的文学和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④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朗松的批评是一种注重文学作品和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批评。在他的一些缺乏

^① 转引自罗歇·费约尔《论批评》，巴黎，阿尔芒－高兰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143页。

^② 罗兰·巴特：《批评文集》，第253页。

^③ 转引自安德烈·拉加德和罗朗·米夏尔编《法国大作家，二十世纪》，巴黎，包达斯出版社1973年版，第668页。

^④ 转引自罗歇·费约尔《论批评》，第143页。

独创性的追随者的手里，这种批评成了一种近世人们常说的“外围批评”，更被夏尔·贝玑讥为“大包围圈式的批评”。但是，我们必须说句公道话，朗松本人并未失去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兴趣和敏感，他明确地指出，个人对作品的直觉是必不可少的。他反对机械地看待资料和学问，认为：“学问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卡片是扩大知识面的工具，是避免记忆不确的工具。”^① 那种只见卡片、不见作品的批评家们只是变本加厉地发展了朗松的实证主义倾向。当然，所谓传统批评，是既包含朗松的批评，也包含他的批评所固有的以及被后人所发展了的弊病在内的。

莱蒙·毕加尔的《拉辛的事业》一书就是在这种批评方法的指导下写成的。这部著作所要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人的拉辛，研究拉辛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物质的、社会的结果。毕加尔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剧作家的拉辛，而是作为路易十四的廷臣的拉辛，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拉辛的一切活动，包括写作悲剧，都为了一个目的：成就功名，争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所研究的内容是：拉辛以什么方式进入各种社会集团，他的生活方式和进取手段如何，他的功名心有什么特点，他的野心使他遭受到何种磨难，他为达到目的采取过什么样的行动，等等。莱蒙·毕加尔认为，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而史家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客观，要把作家与作品区分开来，无须在作品中寻找作家的生平，换句话说，伟人的作品并不说明作家具有伟大的品格，一切都要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之上，因此，毕加尔尽量利用同时代人的见证等第一手材料，而避免轻易地下结论、作判断。他说：“我试图不下判断，不作结论，不把拉辛本人也不想使之协调一致的各种行为简化为一种虚假的统一整体……对我来说，我坚持尽可能只利用 17 世纪的材料，这里的拉辛是人们试图制造的神话之前的拉辛，是时代的拉辛。”^② 他的结论是，拉辛集忠诚的廷臣、热情的诗人、虔诚的基督徒于一身，作为廷臣，他追求国王的恩宠，作为诗人，他关心作者的声誉，作为教徒，他一方面是真诚的，一方面也不忘记从中捞到实际的好处。总之，拉辛是一个生活在各种矛盾相互平衡之中的

^① 转引自罗歇·费约尔《论批评》，第 143 页。

^② 莱蒙·毕加尔：《让·拉辛的事业》“前言”，巴黎，伽利玛出版社 1956 年版。

人，这种平衡经常处于濒临破裂的境地，由此而在当时人的眼里生出好几个不同面目的拉辛。然而，后世的人们只看到他借以传名的悲剧，并以此来判断其人，其结果是，作为廷臣的拉辛被忘记了，作为基督徒的拉辛被忘记了，而只剩下了伟大的悲剧诗人拉辛。莱蒙·毕加尔的研究正在于还拉辛以本来面目，恢复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拉辛，也就是说，是摒除了各种神话的拉辛，是时代的拉辛。

莱蒙·毕加尔搜集了有关拉辛的身世、教育、创作、社交、仕途、家庭等方面十分详尽的资料，写出了这本数十万言的辉煌巨著，表现出深厚的功力。作为问题的一个方面，拉辛其人，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必要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课题。这样的研究，如果能够有助于理解、解释和评价作品，还将成为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础。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把生平研究与作品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应该是机械的、表面的类比或等同，而应该是致力于找出二者之间的辩证的、内在的联系。因此，并非作家生平中的任何细枝末节都可以成为研究者注意的对象。与作品无关的生平细节是没有任何文学上的意义的。同时，把作家生平中的大事挖掘并罗列出来，只是生平研究本身的第一步，还必须对纷纭复杂的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我们看到，在莱蒙·毕加尔的研究中，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作家生平与作品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他对拉辛悲剧的研究仅限于描述这些作品在演出时受到怎样的欢迎和攻击；二是作家的生平没有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释，他把拉辛的一切活动都简单地归结为追求功名的野心的产物。据此，我们认为毕加尔的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外围批评”，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然而，对于所谓“外围批评”，我们是不能弃之若敝屣的。外围批评中的考证版本，搜集作家的生平资料，参考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工作，都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研究所不可少的。有人说，传统批评是文学批评中的“步兵”。这是传统批评的光荣，因为在任何现代化的战争中，步兵都是不可少的。当然，步兵也应该现代化，也能够现代化。事实上，传统批评已经不完全是圣伯夫、泰纳和朗松手中的样子了，它在不断吸收当代人文科学的各种研究成果，从中获得新的力量。传统批评历百年而不衰，它最擅胜场的文学史研究至今仍很兴旺发达，就是明显的证据。应该抛弃的是那种在外围批评上止步不前、用外围批评代替作品批评的批评方法。

总之，如果贝玑说得对，传统批评是一种“大包围圈式的批评”的话，那么，有两种情况应加以区别。如果只是围而不打，自然是不能解决战斗的，如果先将敌包围，然后聚而歼之，那就仍不失为有效的战法。

三 社会学批评

社会学批评又叫作历史—社会学批评，最著名的代表是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年）。他在卢卡契的早期著作的影响下写出了名震一时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隐藏的上帝》（1956年），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黑格尔派”继卢卡契之后的主要代表。1962年，戈德曼又在《小说社会学》这部著作中把他的方法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

社会学批评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试图对一种具体的境况作出有意义的反应，并由此趋向于在行动的主体和主体行动的对象、即周围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据此，戈德曼认为，“一种思想，一部作品，只有被置入一个生命或一个行为的整体中，才能显示它的真正含义”^①。这就是说，对研究对象，例如一部文学作品的认识，在其未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加以具体化时，就总是表面的，抽象的。只有这种“纳入”才能超越局部的、抽象的现象而深入到现象的本质。因此，一部文学作品不能从自身（包括作品和作者）中得到理解和解释。例如，拉辛本人的生活对于理解和解释他的悲剧并无多大的帮助，而联系到让森教派的思想和长袍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拉辛的悲剧就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理解和解释了。

那么，为什么必须以及何以能够将作品纳入“一个生命或一个行为的整体”中呢？所谓“整体”又指的是什么呢？戈德曼认为，“可以假设，唯有历史的全局才有意义，组成它的各部分哪怕是暂时游离于具体的环境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人类实际上是不可能认识历史的全局的，因此，在人文科学上，必须既承认历史的全局的意义，又承认历史的局部的意义。这种关系意味着，随着人们将部分纳入一个比它大些的、包容着它

^① 吕西安·戈德曼：《隐藏的上帝》，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的部分之中，理解和解释就会不断深入”^①。所谓“一个生命或一个行为的整体”指的是某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全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感情的生活。作为“部分”的作品所以能够被纳入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是因为不能把作品看作作者个人的创造，也不能把作者看作无所依附的孤立的个人。戈德曼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一分子，任何行为的主体都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因此，“作品的真正作者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②。

那么，作品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接触点是什么呢？是戈德曼所说的世界观。他认为，作品的想象世界的结构和某个社会集团的精神世界的结构是对称的，或者二者之间有明确的关系。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意识的最高表现就是世界观，即联结一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成员的“愿望、感情和思想的整体”。这种意识通过哲学家或诗人的意识得到了观念上或感情上的表现。伟大的作家是些出类拔萃的人，他们能够具有或尽可能地具有集团或阶级的完整系统的集体意识，并把这种意识转化为文学作品。这样，在多大的程度上表现一个集团或阶级的世界观，就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一部真正重要的作品，其想象世界所表现的意识，如拉辛悲剧中的悲剧观，与某个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如让森派教义，是绝对一致的，作家所创造的世界与他所采取的文学手段也是绝对一致的。考察文学作品的第一步，即理解的阶段，是由研究作品本身到确定作品表现的世界观的过程。戈德曼称这种研究为现象学的研究。研究并不能到此为止，如果这种研究不能进入第二阶段，即解释的阶段，他称为发生学的研究，那么，第一阶段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可分割。他指出：“揭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是个理解的过程，而将其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则是一个解释它的过程。”^③因此，所谓发生学的研究，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结构与某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戈德曼

① 吕西安·戈德曼：《隐藏的上帝》，第105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吕西安·戈德曼：《小说社会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页。

把文学创造理解为“创造一个世界，其结构与作品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结构相似”。例如，他在拉辛的悲剧中辨察出一种反复出现的结构：人，世界和上帝。悲剧主人公在一个充满自私、坏到极点的世界中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绝对价值，而上帝则隐而不现，不给人以任何的指点和帮助。这就是拉辛戏剧中的悲剧观。他又发现拉辛曾经与之发生关系的让森派的教义正是拒绝在一个坏到极点的世界中生活，而让森派教义又恰恰是当时法国的长袍贵族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个阶层既在经济上依赖王权，又在政治上反对王权的发展，处于一种进退维谷、行将消失的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到，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观与某个社会集团的世界观是多么的相似。“任何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是一种世界观的表现”，这正是拉辛悲剧所以重要的原因。

如何把一部作品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去呢？这里，戈德曼提出了“相对整体”的概念，用来指一系列逐步扩大的结构和系统。一部作品是一个部分，但相对一个片断来说，它又是一个整体，因此，只有将片断放入全书中才能理解并解释之。同样，一部作品也必须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考察。那么，究竟多大的范围才是合适的呢？究竟有多少可以这样逐步扩大的范围呢？戈德曼说：“虽然我们认为存在着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构，但并非随意划分都可以发现其含义。因此，寻找有意义的整体就成为研究的指南。”^① 这种有意义的整体就是“足以自足的相对整体”，由正确地划分经验事实而来。他在分析拉辛的悲剧时，就将其纳入一个逐步扩大的结构之中，这个结构是由让森主义极端派、让森主义、长袍贵族、法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等五个小结构组成。他指出，阐明拉辛悲剧的结构，是个理解的过程；将其纳入让森主义，对前者来说是个解释的过程，对后者来说就是个理解的过程；依此类推，直到西方历史，而拉辛悲剧的含义则在这依次的“纳入”中被层层揭示出来。

总之，戈德曼的社会学批评的基本模式是：1. 通过作品的内部结构分析，考察作品的世界观，实际上是对作品的内容进行高度抽象；2. 考察作家所属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有时作家也可以不属此集团或阶级）的

^① 吕西安·戈德曼：《隐藏的上帝》，第338页。

全部精神生活、感情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从中抽象出它的集体意识直至其最高表现，即世界观；3. 把两种世界观联系起来，加以对比，其一致的程度说明作品的重要程度。戈德曼明确指出，他的方法只适于分析第一流的作品，对于二、三流的作品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因为在这类作品中，作品的内容和社会、政治、经济的事实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戈德曼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吸收当代人文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客观的、坚实的基础。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的方法有个很大的缺点，它在力图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同时，仍未能避免机械论的倾向，常把文学分析淹没在社会学的分析之中，使文学批评成为社会学的婢女，文学的美学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不承认反映论，他的社会意识的概念是黑格尔的，而不是马克思的。他把他的方法同时称为发生学结构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倾向。

四 精神批评

在法国，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文学批评，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最初，由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不懂精神分析，一些喜欢文学的精神分析家就难免越俎代庖，用他们为人医病的方法搞起文学批评来，他们的著作与其说是文学批评，还不如说是医疗报告。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精神分析才渐渐在法国文学批评中站稳脚跟，并产生了弥漫性的影响，几乎所有以“新”为标榜的批评派无不打上它的烙印。真正严格地遵循弗洛伊德的学说，试图把精神分析变成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是夏尔·莫隆（1899—1966 年）。他在 1949 年发表的《奈瓦尔与精神批评》中，第一次提出精神批评这名称，在 1957 年出版的《拉辛作品和生平中的无意识》一书中作了全面具体的应用，并在 1963 年发表的《从反复出现的比喻到个人的神话》一书的引言中，对精神批评的原则、方法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与受到精神分析学影响的萨特等批评家不同，莫隆严格地遵循弗洛伊